

瑞典国家公园体系的历程、发展及启示

The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Insights of the Swedish National Park System

张嘉琦 王凯丽 睦淼 杜文武*

ZHANG Jiaqi, WANG Kaili, SUI Miao, DU Wenwu*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自然保护区及其毗邻区景观梯度结构效应与协同机制”(编号: 52278078)

摘要

瑞典国家公园历史悠久, 注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平衡, 倡导生态旅游, 重视社区参与, 其经验对存在发展与保护冲突的中国国家公园具有重要价值。以瑞典国家公园为对象, 从发展历程、分类体系、法律保障、设施管理等方面, 系统梳理瑞典国家公园的建设、运营与管理模式。最后, 基于瑞典国家公园在动态监测网络、人类活动管控、社会参与机制 3 个方面的适应性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提出法治体系动态协同、科学监测动态适应、协同治理持续发展, 社区共治生态共赢 4 项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建议, 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管理方式。

Abstract

Sweden's national parks have a long history. They have emphasized the balance between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vocated ecotourism, and strongly emphasiz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ir experience is of great value for China's national parks, which have conflict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parks of Swed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ir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s from aspects such as development histo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legal guarantee and facility manage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uitability control in three aspects of the dynamic monitoring network, human activity control,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Swedish national parks, it offers four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emerging national park system: dynamic legal coordination, adaptative scientific monitoring, sustain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co-management with local communitie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text-specific, resilient national park governanc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文章亮点

1) 深入梳理瑞典国家公园百年发展历程, 批判性地指出瑞典治理中的矛盾, 如权责失衡、制度权限等; 2) 从瑞典国家公园实践中总结动态监测网络、人类活动管控、社会参与机制的适宜性治理框架; 3) 基于瑞典经验教训, 结合中国国情, 提出多项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社区参与; 适应性管理; 国际经验; 可持续发展

Keywords

National parks; Protected area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daptive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24-12-28

修回日期: 2025-02-22

国家公园因兼具生态保护与服务人类的双重职能^[1], 在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法律碎片化以及制度动态适应性缺失的双重难题。瑞典作为全球自然保护先驱, 其国家公园发

展既展现了制度创新, 也面临着制度挑战。自 1909 年瑞典设立首批 9 个国家公园以来, 已逾百年。随着全球对国家公园功能定位的改变,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加

剧, 以及经济下滑带来的现实困境, 瑞典不断调整国家公园的管理方案并拓展其管辖范围。至今, 瑞典的国家公园数量已达 30 个, 占国土面积的 2%。然而, 在发展过程中亦存在中央集权与社区参与之间的矛盾, 以及气候变化加剧下暴露的制度弹性短板。2010 年, 《国家公园扩建计划》(Nationalparksplan för Sverige: Långsiktig plan) 引起萨米原居民 (Saamis) 的抗议, 揭示了在治理过程中需重视法律在协调传统地权与生态保护方面所面临的难题^[2]。2021—2023 年的环境监测报告揭示, 气候变化导致公园生态承载力下降, 公园已无法支撑游客量的持续增长, 而管理机构因预算减少而无法优化基础设施^[3]。

中国在立法层级与协同治理方面同样存在不足^[4]: 中央与地方在管辖方面的权责边界模糊^[5];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在管辖权上的矛盾, 进一步引起部门间管理权责的模糊^[6]。因此, 需在顶层设计与地方执行之间构建更稳固的平衡机制。在当前治理环境下, 国家公园与地方政府难以确保公园的保护成效, 也无法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困境。此外, 三江源国家公园等体制试点区域也存在生态移民安置过程中补偿机制缺失的问题, 原居民的基本权益保护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之间仍存在显著矛盾。

于中国而言, 瑞典的发展经验价值不仅在于其成果, 更在于其发展过程中所犯错误的警示意义。现有研究着重分析瑞典法律条文与管理方式, 却较少讨论该机制下存在的负面表现, 且尚未归纳总结瑞典国家公园治理的成功方式对中国国家公园发展与管理的启示。本文期望突破以上局限, 通过文献研究法, 解析瑞典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体系构建以及风险应对措施, 提出国家公园管理的本土化方式, 并为全球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提供东方经验。

1 瑞典国家公园体系的发展历程

1.1 初期国家公园的建立

早在 1880 年, 即美国首次探讨国家公园议题的 10 年之后, Nordens-kjöld 提出为后代提供“一个真正反映祖国面貌的真实形象”, 即“当湖泊范围还很广时, 还有未被人类活动影响的原始海岸线和森林”。但该提议并未取得成果^[7]。1904 年, 瑞典兴起自然保护运动, 德国教授 Hugo Konwentz 在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 (Swedish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 SSAG) 上发表题为“威胁自然景观的危险和保护建议”的演讲, 直接推动了瑞典保护自然以及自然遗迹的进程。1909 年, 瑞典颁布了《国家公园法案》(Lag om Nationalparker), 并在同年设立首批 9 个国家公园, 成为欧洲最早开展国家公园保护的国家之一^[7]。此时, 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是保护具有代表性和美学价值的自然风景, 同时为公众提供接近自然的机会。

在建立首批国家公园的过程中, 瑞典政府已考虑到融合高山景观和森林景观等多样化的自然环境^[8], 以不损害自然

状态的标准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生态加以保护。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 北欧国家常用本国的地理环境来隐喻民族的坚韧品质, 以此强调“土地与民族”的共生关系, 这种理念被称为国家浪漫主义, 其核心是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受此影响, 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成为保护瑞典自然遗产的重要手段^[9], 还为当时的科学家提供了如阿比斯库 (Abisko) 科研中心等旨在探究和保护北极高山生态系统的研究基地, 推动了科学研究与公众教育的结合。在此阶段内, 国家公园的保护理念主要源于贵族精英对于“未被干扰的自然”的想象, 实际上并无明确的执法条例与合理的资金投入, 国家公园的保护成效甚微^[10]。

1.2 中期国家公园的拓展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政府启用法律手段, 即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以长期保护具有生态文化及科研价值的区域^[11]。1918—1962 年瑞典政府着力推动国家公园的拓展, 设立了 7 个新的国家公园, 进一步完善了瑞典自然保护地体系。在此阶段内设立的国家公园新增了湖泊和湿地等更多样化的景观, 在初期公园体系的基础上更体现了瑞典地理形态的多样性。瑞典国家公园的保护目标正从单一景观向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转换。

1980 年, 帕耶兰塔国家公园 (Badjälännda National Park) 将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萨米人的传统放牧区划入核心区范围, 该举动因侵犯当地居民权益而引发萨米人抗议^[12]。虽然瑞典通过修订《自然保护法》(Naturskyddslagen) 与《物种保护条例》(Artskyddsförordningen), 加大了国家公园的保护力度, 但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未能解决人类活动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矛盾。该时期国家公园的建设反映了瑞典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 也表明了政府对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

1.3 现代国家公园体系的扩展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瑞典国家公园体系进入了现代扩展阶段。1989 年, 瑞典制定了《瑞典国家公园规划》(Nationalparksplan för Sverige), 结合政府推出的国家公园动态规划方法, 定期更新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与保护策略^[13]; 通过科学评估区域生态价值, 对已有国家公园进行范围扩张和管理优化; 并提出了新的国家公园选址标准^[7], 以确保瑞典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在此规划与动态规划方法的推动下, 瑞典国家公园的管理策略与时俱进, 公园数量稳步增加, 保护目标也从自然景观转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完整性。

随着瑞典的保护目标日益全面, 瑞典国家公园的管理体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实现了职责分明。瑞典国家公园的主要管理体系是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水土保持中心、林业局以及公园所在地、县的相应部门共同管理的模式, 政府还通过实施“地方自然保护项目” (Local Nature Conservation Programme) 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同管理与监督^[14]。这种合作模式能够提高公众对自然保护的认知水平和支持度, 有效地将国家公园与地方经济结合

起来,使得自然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得以并行。截至2020年,瑞典国家公园数量已增至30个(图1),涵盖了森林、湿地、海岸线和山脉等多种自然地貌类型,未来还会针对性地增加新的国家公园。

瑞典国家公园的管理已趋于成熟,但气候变化对制度规划的影响仍给瑞典国家公园带来难题。例如,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萨勒克国家公园(Sareks National Park)的冻土消融速度加快,而同期修订案未能及时针对这一特殊情况调整公园游客承载量^[15]。这种自然变化冲击制度惯性的现象,给萨勒克国家公园造成了不可逆的生态破坏。

2 瑞典国家公园体系解析

2.1 类型体系

瑞典国家公园体系围绕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科教旅游3个核心功能,形成了自然保护型、文化景观型和旅游观光型的3种类型,旨在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三者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共进。

自然保护型国家公园致力于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保护。此类国家公园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在其边界划定后,几乎不在内部建立基础设施,并对游客行为进行严格限制,为动植物提供稳定的栖息地,有效维持了区域生态平衡,是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关键区域^[16]。

文化景观型国家公园则突出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共同保护。此类型公园在规划法案中被提及,是为了保护并展现传统农业景观与历史遗址的独特魅力^[17]。文化景观类型的国家公园保护以往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形成的和谐环境,既注重文化延续,也致力于保护自然。

旅游观光型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寻求平衡。该类国家公园在创建伊始或后期,受瑞典户外生活政策和目标的影响,通过科学规划、合理管理,以及设立健全的、低影响开发的游憩设施,为游客提供体验自然与接受生态教育的机会,并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8]。

2.2 法律体系

瑞典国家公园法律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碎片化到系统整合、国内独立治理到国际协作治理的转变。19世纪末,为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瑞典政府具有前瞻性地出台了《健康保护法》(Hälsoskyddslag),但该法律尚未涉及国家公园的相关内容。1909年,瑞典议会颁布了第一部

《自然保护法》(Naturskyddslage),该法案构建了完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涵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类型的保护区^[19]。此法律虽规定了国家公园将用于何种目的,但未说明具体理由。1987年,《国家公园条例》(Nationalparksförordning)出台,该条例明确了各国家公园的建立目的,以及对国家公园进行监督、监测、罚



图1 瑞典30个国家公园分布(截至2020年)

Fig.1 Distribution of Sweden's 30 national parks (as of 2020)

款等相关事宜。随着国家公园的不断新建与扩展,该法律持续更新至今。1999年,瑞典对以往的环境法律框架进行了重大整合与改革,出台了《环境法典》(Miljöbalk),其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园的相关术语,将环境保护与城市规划、水资源管理、采矿、工业和农业活动等进行整合,确保不同领域的政策协调一致。随着 Natura2000 自然保护地网络与欧盟多项自然保护指令的实施,瑞典国家公园的法律体系也走向国际化,部分国家公园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共同约束。进入 21 世纪,瑞典国家公园法律体系加速走向国际化,通过将《栖息地指令》(The Habitats Directive)、《鸟类指令》(Conservation of wild birds)纳入《环境法典》^[20],依托《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提升跨国治理效能。当前瑞典国家公园法律体系以《自然保护法》《国家公园条例》为核心,以《环境法典》为支撑,通过本土化执行国际法协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但是,缺少对传统生计的补偿,以及国际承诺与国内实践之间的落差,是当前瑞典国家公园法律体系亟待处理的问题。瑞典通过严格的法律禁止伐木、采矿及狩猎等对国家公园境内生态造成负面影响的传统生计,但其补偿机制并不健全。保护区采用一次性支付市价 125% 的方式补偿土地所有者,却缺少对当地居民长期生计转型的规划^[21]。这种法律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利益不平衡,加剧了当地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反对情绪。此外,尽管瑞典国家公园法律体系已与国际对接,如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承诺推进协同治理,但因中央集权和地方影响力低下的管理缺陷,国内实践存在滞后现象。同时,在新的国家公园规划伊始,瑞典宣称采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的 II 类保护地标准(该标准强调保护文化资源,使其与环境保护目标相协调),却将萨米传统土地界定为“未受人类干扰”区域,这种界定既否定了萨米部落的生态文化价值,又禁止其传统生计活动,导致国家公园内部生态系统失衡,反而未能实现有效保护。

2.3 设施体系

瑞典国家公园普遍采用国际游憩机会谱(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ROS 模型)进行分区规划,按照与人类影响、物理环境、游客体验和适当活动相关的标准,将公园划分为未受破坏区、低活动区、高活动区以及发展区,不同的区域内设施的密度与类型也有所不同^[21]。未受破坏区仅保留原始步道和应急标识;低活动区设置简易避难所与生态厕所;高活动区配备标准化步道和观景平台;发展区则集中布置游客中心、停车场及自然教育设施,形成“核心区荒野化、缓冲区体验化、外围区服务化”的空间格局。

现阶段 IUCN 认为国家公园能够在受到少量人类干扰的情况下,继续开展包括进化进程在内的自然生态进程^[22]。瑞典环境保护署要求国家公园在保障生态完整性的前提下,兼容科研、户外休闲和生态旅游。因此,随着旅游需求的持

续增长,国家公园在内部设施规划上力求“最小化干预”原则。在确保游客充分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将步道、观景台等设施等基础设施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23]。

2.4 管理体系

瑞典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以国家公园的规划与设立、监督与管理为核心框架,形成了多层级、多主体协作的系统。该体系依托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国际合作与地方实践的融合,旨在实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环境法典》中指出,瑞典国家公园属于国家的大型连续区域,其主体需呈现特定景观类型自然状态下的土地或水域,或因人类活动发生显著变化但仍保留核心生态价值的土地或水域。划定国家公园区域时,瑞典环境保护署需结合 IUCN II 类保护地的标准,对选址进行科学评估,经议会同意及地方协商后,由政府将其指定为国家公园。不同的国家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因地制宜地进行分区规划与功能设计,根据功能分区合理规划基础设施类型与搭建交通网络,并引入社区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旅游业的发展。在公园后期维护管理的过程中,瑞典环境保护署负责对接国际合作,制定并发布全国性的保护政策和指导性的方针条例。之后,郡县行政委员会负责对其行政范围内指定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监督管理,并处理跨市域情况下的环境问题。林业局及环境公共卫生委员会等相关职权机构负责处理违规行为,执行日常监督活动并参与地方管理^[24]。此外,非政府组织如瑞典自然保护协会、学术机构等通过对国家公园管理成效的科学评估和生态物种监测,推动相关政策的优化^[25]。

瑞典国家公园通过分类灵活治理、整合法律条例、动态调整规划,以及多方协调治理的方式,有效减少了国家公园管理冲突,为瑞典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处理特殊情况案例时,这套法律框架与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如萨米土著与国家公园管理的冲突事件。萨米人也称拉普人,属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混合的北欧民族,主要分布于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地区,以游牧、饲养驯鹿和捕鱼为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出,瑞典萨米人的游牧范围约占瑞典北部领土的 35%,其中涉及《自然保护法》规定的国家公园范围内严格限制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新的国家公园范围的划定致使萨米人的游牧质量降低,驯鹿的死亡量上升。尽管萨米人可通过地方自然保护项目,即 LONA 组织提交建议以维护自身权益,但瑞典环保署具有最终决策权,鲜少采纳放牧区域调整的建议。这更突显了瑞典在环境治理和管理方面,长期以来存在权力集中、地方影响力和控制水平较低的问题^[26]。对比之下,挪威与芬兰地区更注重保护萨米人的权利,允许当地萨米人直接参与国家公园规划^[27]。瑞典通过科学评估认定萨米人过度放牧给国家公园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据此压缩其生存空间,这表明瑞典在自然保护、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民族文化之间并未做好权衡。这也为中国国家公园在管理过程中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警示。

3 瑞典国家公园的多维度适应性治理

3.1 动态监测网络

瑞典国家公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了动态监测网络与科学预警体系,为我国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近20年来,瑞典主要面临的自然灾害如山火、洪水、风暴等,在摧毁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时,对国家公园等保护区造成永久性损毁的负面影响^[28]。为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瑞典多个国家公园在核心保护区建立科学监测站点,这些站点通过集成环境监测、生态预警和科研功能,构建了动态保护网络。在瑞典北部以高山景观为主的国家公园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部分物种栖息地缩小、雪线升高、冻土退化等。其中,阿比斯库国家公园(Abisko National Park)依托其长期运行的北极生态研究站,整合了气候、水文、土壤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实时追踪雪线变化、冻土融化速率及关键物种的栖息地迁移轨迹,为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29]。

3.2 可持续发展

瑞典国家公园通过空间分层管控、行为动态调控与法律约束的策略,系统性平衡生态保护与公众需求。以菲吕山国家公园(Fulufjället National Park)为例,该园在空间维度上采用垂直与水平双重分区,设立从地下至树冠层的禁止人为干预的绝对保护区,并基于ROS模型将地表划分为四级管控区(荒野区至发展区),通过分级开放实现生态敏感性与公众访问权的平衡^[30-31]。在行为管理中,运用无人机巡航、热成像等科技手段精准监测违规活动,如在荒野区露营、越界徒步等,并根据实时数据动态调整路线规划。在法律层面实施分类管控与连带责任制度,要求旅游企业需获得“泛公园合作伙伴”认证,若旅行社未履行游客行为监管义务,需承担生态修复费用,从而形成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协同治理体系。该方式使得菲吕山国家公园保护成效显著,并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3.3 社区参与

在瑞典长久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机制构成了多元协作的网络。在参与形式上,政府设立地方管理委员会,整合原居民代表、旅游从业者和环保组织的力量,形成多主体协商平台;实施经济激励政策,雇佣当地居民担任自然导游,使居民从“资源使用者”转变为“保护参与者”,鼓励其积极参与自然保护工作,将旅游旺季的导游服务转化为社区就业机会,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居民对于保护自然资源的参与度与责任感,形成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循环^[32]。在文化整合方面,瑞典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公园的处理方式相似,即通过立法承认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并开展“自然解释”活动传播本土生态知识,强化原居民的文化认同^[33]。此外,瑞典政府通过推动地方自然保护项目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不断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鼓励公众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使自发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深入人心^[34-35]。

4 对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启示

4.1 法治体系动态协同

瑞典国家公园的法律治理体系通过系统整合、动态适应与国际协同等多维机制,为完善我国国家公园法律框架,实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制度化平衡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我国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法》《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嵌入同一框架内,明确管理权限与违规处罚标准,避免不同法规在管辖权上的矛盾。其次,中国需建立科学驱动的法律修订机制,将气候变化应对条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草案,并设立跨部门法律评估委员会,根据生态保护成效与社会需求动态修订法规。此外,瑞典将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通过《环境法典》明确国际义务与本土实践的衔接路径,例如萨勒克国家公园的冻土保护措施既符合国际公约要求,又与本土法律互补。中国可借鉴此模式,将《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嵌入国家公园法律,强化跨境生态协作。同时,瑞典通过分类管控与连带责任制度,形成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协同治理体系。这一“硬约束”与“软激励”结合的模式,为中国破解“多头管理”与“责任模糊”问题提供了参考路径。

4.2 科学监测动态适应

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可借鉴瑞典国家公园的科学监测网络与动态管理机制,以提升生态治理的适应性与韧性。“监测-评估-响应”的方式使瑞典国家公园能够灵活应对突发性生态危机或人类活动压力,确保保护策略与生态变化同步。

我国公布的首批国家公园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等,均面临着地域广阔、生态系统多样、管理复杂等多重挑战。借鉴瑞典经验,我国需建立监测体系,集成卫星遥感、地面传感器及无人机技术,覆盖国家公园内重点区域的气候变化敏感指标。同时,应增大规划与法规的动态弹性。例如,针对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出现的竹亚科Bambusoideae植物大面积开花导致大熊猫栖息地变化等突发问题,需借助科学预警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动态调整保护区边界或限制人类活动范围。还应建立跨部门评估机制,定期根据生态监测数据修订保护策略。此外,可引入瑞典“阈值预警”机制,当关键的生态指标突破临界值时,立即启动保护措施。由科学驱动的动态管理,既能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增强我国国家公园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适应能力,为大尺度、多样的自然保护提供制度化解决方案。

4.3 协同治理持续发展

瑞典国家公园通过科学规划与严格的人类活动管控体系,在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间实现了有效平衡,其经验为我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一,针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弹性,因地制宜制定分区分级管控方案,如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需根据栖息地敏感度划分核心区与适度利用区。第二,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

动态评估国家公园的游客承载力与生态阈值，对不同游客类型（科研、教育、旅游）实施差异化行为限制。第三，通过立法明确活动分类与责任机制，强化企业生态修复义务。第四，在入园前设置强制性生态教育环节，通过意识引导正确行为，激发公众自主约束行为，增强其可持续利用意识。这种协同治理路径既能保障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又能通过低影响活动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4.4 社区共治生态共赢

瑞典国家公园通过社区深度参与机制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的双赢。我国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等跨区域保护地推广“生态管理员”制度，将巡护、科研辅助等岗位向当地居民开放，并结合生态修复项目提供就业机会，既增加居民收入，又增强其对生态保护的责任感。同时，建立特许经营企业收益共享机制，要求旅游、科研等企业按比例将收益注入社区基金，用于生态补偿或教育支持，确保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的公平分配。此外，通过自然教育活动，如公园解说、文化传承项目等，提升居民对国家公园价值的认知，将生态保护理念转化为社区共识，促进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保护实践的融合。社区共治可有效缓解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的矛盾，通过社区深度参与提升国家公园管理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多重目标。

5 结论

本研究深入解析瑞典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分类体系、法律框架、设施及管理体系，揭示了其在百年发展历程中的深层矛盾，发现其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失衡导致的社区形式化参与的问题，并面临着由法律在传统生计补偿方面的制度缺失引发的原居民权益受损的困境。最后结合瑞典国家公园的法律框架与多方协作机制，从法治体系、科学监测和社区共治等方面为我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公园提供建议。

本文丰富了对瑞典国家公园发展历程的批判性研究，创新地将瑞典多维度适应性治理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为中国国家公园治理引入国际视角。然而，受限于地方案例数据深度不足，研究对瑞典国家公园治理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将通过对比两国国家公园在社会参与、生计补偿制度及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案例，结合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调查，评估国家公园的管理效能；同时，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数字化监测技术应用以及人类活动影响调控等新兴领域，以此提升国家公园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

注：图1底图审图号为GS（2025）1508号。

参考文献：

[1]IUCN. 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M]. Gland: IUCN, 2012.
[2]FLODÉN L, REIMERSON E. Conser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laims: Saemie inclusion and influence in a Swedish national

park process[J]. *Frontier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2023, 3: 1105415.
[3]NATURVÅRDSVERKET. Återrapportering av medelsanvändning och resultat för skydd av och åtgärder för värdefull natur 2021–2023: Redovisning enligt 8 c § förordningen (2012:989) med instruktion för Naturvårdsverket[R]. Stockholm: Naturvårdsverket, 2024.
[4]ZHOU D Q, GRUMBINE R E.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Experiments with protecting nature and human livelihoods in Yunnan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1, 144 (5) : 1314-1321.
[5]黄宝荣. 健全国家公园治理体系，高质量推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 (2) : 219-229.
[6]XU J, MELICK D R. Rethin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rotected areas in southwestern china[J].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7, 21 (2) : 318-328.
[7]LÖFGREN R. Nationalparksplan foer Sverige[M]. Stockholm: Naturvårdsverket, 1989.
[8]王修齐, 张铭. 瑞典的国家公园 [J]. *陕西林业科技*, 1990 (4) : 68, 72.
[9]徐大陆. 外国国家公园综述——墨西哥、英、法、波兰、瑞典、芬兰、西班牙 [J]. *中国园林*, 1991, 7 (3) : 61-63.
[10]LÓPEZ E M. Transforming Kiruna: Producing Space, Society, and Legacies of Inequality in the Swedish Ore Fields[D]. Uppsala: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2021.
[11]ANNIKA D, RICK R, KLAS S. National park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mparing access rights and ideological legacies in three countries[J].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2010, 8 (3) : 209-224.
[12]MÖRKENSTAM U. Organised hypocris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rights regime in Sweden[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9, 23 (10) : 1718-1741.
[13]DAVIDSSON Å. Can historic natural disturbances enable conservation opportunities? Evidenc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in Sweden[J].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23, 23 (4) : 307-327.
[14]钟永德, 徐美, 刘艳, 等. 典型国家公园体制比较分析 [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8 (1) : 45-51.
[15]NENASHEVA M V. Resilience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ctic communities'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J]. *Arctic and North*, 2022 (47) : 157-171.
[16]REINIUS S W. A ticket to national parks?[C]//FROST W, MICHAEL HALL C. *Tourism and National Park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Histories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2.
[17]MELS T. Nature, home. and scenery: The official spatialities of Swedish national park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2, 20 (2) : 135-154.
[18]NIKODINOSKA N, PALETTO A, FRANZESE P P, et al.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protected areas: the case of the Abisko National Park (Swede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2015, 3 (4) : 355-369.
[19]ANDERSSON S, RAMNÄS O, RYDBERG T.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R]. Stockholm: Naturvårdsverket, 1992.

- [20] FAUCHALD O K, GULBRANDSEN L H, ZACHRISSON A.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in Norway and Sweden: examining pathways of influence in similar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diversity Science, Ecosystem Services & Management*, 2014, 10 (3) : 240-252.
- [21] NORDISK MINISTERRÅD. Visitor Management in Nordic National Parks[R]. Copenhagen: Nordisk Ministerråd, 2019: 50.
- [22] DUDLEY N, PARRISH J D, REDFORD K H, et al. The revised IUC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the debate and ways forward[J]. *Oryx*, 2010, 44 (4) : 485-490.
- [23] ÖSTERLIN C, SCHLYTER P, STJERNQUIST I. Different worldviews as impediments to integrated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s from protected areas in Northern Sweden[J]. *Sustainability*, 2020, 12 (9) : 3533.
- [24] THEWS B, HÖJDING P, JANSSON B. Swedish environmental la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wedish legal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M]. Stockholm: Naturvårdsverket, 2017.
- [25] HOVIK S, SANDSTRÖM C, ZACHRISSON A.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in Norway and Sweden: challenges in combining central governance and local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2010, 12 (2) : 159-177.
- [26] BRÄNNLUND I, AXELSSON P. Reindeer management during the colonization of Sami lands: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f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1, 21 (3) : 1095-1105.
- [27] SANDBERG A. Collective Rights in a Modernizing North: On Institutionalizing Sami and Local Rights to Land and Water in Northern Norwa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2008, 2 (2) : 269-287.
- [28] SKÖLD GUSTAFSSON V, ANDERSSON GRANBERG T, PILEMALM S, et al. Identifying decision support need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to multiple natural hazards: an activity theory approach[J]. *Natural Hazards*, 2024, 120: 2777-2802.
- [29] JOHANSSON M, CHRISTENSEN T R, AKERMAN H J, et al. What determines the current presence or absence of permafrost in the Torneträsk region, a sub-arctic landscape in Northern Sweden?[J]. *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2006, 35 (4) : 190-197.
- [30] SANDELL K, FREDMAN P. The right of public access-opportunity or obstacle for nature tourism in Sweden?[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2010, 10 (3) : 291-309.
- [31] BEERY T, OLSSON M R, VITESTAM M. Covid-19 and outdoor recreation management: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connection to nature, and a look to climate adaptation[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21, 36: 100457.
- [32] 陈维伟. 瑞典森林公园建设管理经验及其借鉴 [J]. *中南林业调查规划*, 2008 (3) : 62-64.
- [33] 杨丹, 阎凯, 金云峰. 欧洲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体系及启示 [J]. *广东园林*, 2020, 42 (4) : 20-26.
- [34] 凌先有. 瑞典的生态文明建设 [J]. *中国水利*, 2008 (7) : 52-53.
- [35] HÖJER O, ERIKSSON D, HAMMERSLAND J, et al. Swedish nature conservation 100 years[M]. Stockholm: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9.

作者简介:

张嘉琦 / 2000 年生 / 女 / 甘肃嘉峪关人 /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 404100) / 在读硕士研究生 / 专业方向为自然保护地与国家公园

王凯丽 / 2000 年生 / 女 / 重庆人 /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 404100) / 在读硕士研究生 / 专业方向为自然保护地与国家公园

眭淼 / 1999 年生 / 女 / 重庆人 / 硕士 /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 404100) / 专业方向为自然保护地及其毗邻区协同治理

杜文武 (* 通信作者) / 1982 年生 / 男 / 四川泸州人 / 博士 /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 404100) / 教授 / 研究方向为国土景观保护与生态修复,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空间治理 / E-mail: duwenwu@swu.edu.cn